

# 纪念改革开放 40 周年： 经济前沿的困惑与思索

文 / 萧 琛

**摘要：**2018 年是改革开放 40 周年，是贯彻党的十九大精神的开局之年和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关键一年。2018 年经济走势如何？“一带一路”建设前景怎样？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如何看待？“金融新政”冲击如何应对？国企改革思路新在哪里？“国退民进”与“万宝大战”如何看待？资本市场的转型如何看待？房地产调控新思路如何看待？如何保护知识产权和创新？比特币与“区块链”带来何种商机？应否创建“中国经济学派”？是改革开放前沿地带经济实践当前遇到的普遍困惑。对这些问题的理论思索，既展现“中国经济奇迹”在改革开放 40 年这一伟大时间截面的改革开放理论内涵，也透视各经济侧面改革开放的来龙去脉，以助力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

**关键词：**中国经济增长；“一带一路”建设；供应改革；金融新政；中国经济学派  
**中图分类号：**F12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0138(2018)02-0005-08

5

2018.2

2018 年是改革开放 40 周年，是贯彻党的十九大精神的开局之年和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关键一年。从 2017 年 3 月到 2018 年 2 月，笔者有幸四度飞赴改革前沿地带浙江宁波，为该市党政干部、国企和民企的领军人讲授当前宏观经济动向与解读政策精神。每次演讲后都遇有大量很好的提问，令笔者对前沿地带的经济脉动能有较切身踏实的把握。同期，笔者也曾三赴广东深圳一带，此外还在中国商务部和北京统计局等部门做过演讲与答问。诸多来自当前改革实践的理论困惑，显然提出了挑战、提供了启迪。现将数百个问题归成本文的 11 个，并将自己的探索与心得整理成文，以抛砖引玉。希望能大致展现改革开放 40 年这一伟大时间截面的理论内涵，也希望透视各经济侧面的来龙去脉，以助力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夺取新时代中国

**基金项目：**北京市社会科学界联合会重大决策咨询课题“对中国梦的认识及推进首都工作的战略设想”（2013-17-JCC-001）

**作者简介：**萧琛，北京大学经济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北京市，100871。

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

### 如何看待 2018 年经济走势?

2017 年中国经济获得了喜人的超预期业绩。据中国国家统计局 2018 年 1 月 18 日发布的数据,2017 年中国国内生产总值(GDP)达到 82.7 万亿元,按可比价格计算,同比增长 6.9%。<sup>[1]</sup>中国经济实现自 2011 年以来的首次增长加速!在此之前,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等国际经济组织也纷纷上调了 2017 年、2018 年中国经济的预期增长率。如,世界银行 2018 年 1 月 9 日发布的《2018 年全球经济展望》报告,将 2017 年、2018 年中国经济增长率分别上调 0.3 和 0.1 个百分点。<sup>[2]</sup>2018 年中国经济的增长应该说会有一些困难,目前多数预测都表明很难好于 2017 年。国内比较有代表性的观点当属刘世锦提出的“宏观经济可能逐步进入大 L 型加小 W 型的运行轨道”。<sup>[3]</sup>世界银行的最新预测数据则显示,2018 年中国经济增长率即使被上调之后也只有 6.4%。这是因为,投资中的房地产拐点性调整正在深化,(准)公共品产业(如民生产业、绿色产业等)的投资增长所存在的瓶颈和阻力在加大,新的增长点很多,但却都需要形成新的增长模式。提振准公共品产业和事业性成就,政府挺身而出无疑更加必须,但必须配备足够的资金与补贴,或有更大规模的减税降费。否则民营投资严重下滑的情况恐难以扭转。

经济形势很好并不意味着经济下行的压力已经消失,努力得来的成就实质上只是出色地抵消了这些压力。“稳字当头”“稳中向好”“稳中求进”<sup>[4]</sup>等提法,无疑说明了中国政府的清醒、稳健与明智。全面经济扩张的到来,显然还需要进一步积蓄能量与创造条件。<sup>[5]</sup>根本原因在于长期粗放增长所留下的后遗症和各种隐患的严重程度非同寻常。例如,产能过剩,曾几何时,规模以上企业的开工率仅为 78%,三分之一的企业的开工率仅为 70%,煤炭钢铁、房地产建材等企业,有的过剩率竟高达 40%! 2017 年能取得上述优异的成绩单,实在是竭尽所能、难能可贵。这其中,“一带一路”建设缓释过剩产能的作用可谓特别显著。例如,钢铁产业在

房地产下行之后的过剩率曾高达 40%。而经过一年多的去产能去库存之后,钢产量不仅没有减少,反而从 10 亿吨增长到了 11 亿吨。而同期世界钢铁期货市场上中国钢材的价格仍然在看好。

### 如何看待“一带一路”建设的意义、挑战与前景?

“一带一路”建设是党的十八大以来最富创建最具眼光的战略举措。上述产能过剩的化解,可行的上策当属向国际市场空间锐意拓展,以便稀释和输出 30% 左右的过剩产能,进而为推进和落实“十三五”规划创造从容的产能环境。否则,若让 19 万个开工率严重不足只能靠借新还旧的企业统统破产、工人统统失业,则整个社会的稳定势必要成为很大的问题。中国提出共建“一带一路”重大倡议之后,国际社会出现了“中国推行新殖民主义”的疑虑和误解。其实,中国的资本输出(且借用一下)与老牌帝国主义的资本输出已有本质区别。<sup>[6]</sup>中国输出的是生产能力而不仅是消费品,更不是其他“劣品”。而这正是接受国迫切需要并翘首以盼的。“一带一路”建设之所以受到广泛的欢迎,注脚应在于此。值得注意的新动向是,美国、日本、印度等国也开始酝酿其替代中国的“一带一路”战略。难道这不说明:他们的觉悟比中国晚了一步?

“一带一路”建设当然充满挑战,甚至可以说需要中国奋不顾身披荆斩棘。小国穷国的生存之道,往往都是“精打细算”甚至不无“耍赖奸诈”;利用大国博弈竭力左右逢源的企图应该说随时可能出现。而大国强国对中国崛起的阻碍与打压之心,恐怕是路人皆知、防不胜防! 2015 年英国不顾美国伙伴的侧目而领头前来参与中国主导的亚投行,应该说是中国外交战略和执政魅力的成功写照。2017 年“一带一路”国际合作北京峰会后,与中国签订国际经营合同的国家已经超过 65 个,大大超过了当初所预计的 29 个。截止到 2017 年,全世界八大超级工程,中国已经拿下了其中的六大,剩余两大也是势在必成。这包括地处美国后院的尼加拉瓜运河。巴拿马与中国台湾的断交,其总统

2017年11月历史性首次访华签约,是否能体现着该运河项目势在必成的风向?“一带一路”建设捷报频传的重要原因,还来自中国的比较优势已经被利用得出神入化。高铁、核能方面,中国的优势可谓全世界领先。至于未来最终的成功,当然还应取决于工程上马之后的管理运作和分配机制的到位。这方面的挑战当然不可等闲,迫切要求云计算、大数据、物联网乃至区块链等新技术在“诚信传递”和“代理忠诚”等领域的助力。世界互联网大会在中国杭州的四度召开,贵州大数据中心两度成功举办国际大数据论坛,都体现中国政府的全球眼光和重视先进技术手段的智慧。

### 如何看待“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由来、风险与前景?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借鉴供应经济学(supply side economics)又结合中国国情发扬光大的概念。1980年里根上台前后所推出的振兴经济的口号就是推动供应经济改革。代表性学术研究成果是拉弗曲线:减税越多、投资产出越多,进而税源越充裕,镜像是财政赤字将会减少。供应经济学是反思凯恩斯经济学的产物。美国在20世纪70年代前后曾遭遇十多年的经济停滞膨胀的经济病。病因在于凯恩斯经济政策刺激拉上需求的负作用的长期累积。凯恩斯经济学重视的是短期经济需求一侧,而供应经济学则重视中长期经济的供应一侧,也即鼓励投资、提高效率和提振实体经济。产品丰裕了、就业和通货膨胀等顽疾便都将自动化解。里根政府8年任期加上后来的老布什政府4年任期,到20世纪90年代初美国经济终于开始享受到供应改革的成果。克林顿政府执政以来近20年的美国经济的增长一直都是主旋律,而“911”和次贷危机只是少许插曲。

借鉴美国供应经济学,体现中国政府的及时、明智与果敢。因为中国近年也遭遇到了停滞膨胀的病痛,而且难以走出。2016年就很典型,需求在大规模拉上的同时,供应却在显著地下降。不仅国企投资裹足不前,而且民企更拖后退,一反改革开放多年来的常态。有鉴于中美国情相去甚远,且中国的国有企业更可以

说是一种特例。因此,如果简单效仿1986年的里根大减税和2018年的特朗普大规模减税,则整个经济势将无法承受。由此,中国政府加上一个“结构性”,绝非措词上的标新立异,而是需要囊括更丰富的内涵。后来的实践也表明这个考虑意义深远。按照国外教科书,大规模减税显然是供应改革的精髓,但中国这方面的进展恐怕难尽人意。李克强总理2017年年中的一个讲话曾提到,2年中中国的减税的规模可高达2万亿元!应该说这已经是艰苦努力的数字。但是,若要启动新增长点所需要减税应该是多少呢?根据有关估算,大概不少于20万亿元!而正是由于“结构性改革”,才导致2017年乃至“十三五”的喜人局面!<sup>[7]</sup>即将到来的2018年“两会”,一系列更大手笔的规划工程都有可能提上议事日程。近期“红旗河”西部引水工程,已经酝酿论证完毕。

### 如何看待当前货币政策收紧对于企业投融资的冲击?

“去杠杆”动真格,是2017年以来“金融新政”的主要内涵。旧常态经济累积下来的“货币超发”已经相当严重。1986年“万元户”即可闻名遐迩,而如今没有半个亿恐怕很难算是富人。货币严重超发是经济脱实向虚、巨额资金体外空转的根源。超发的货币经由银行理财和管道业务流向房地产、地方政府融资平台乃至股灾前后的股市,致使金融部门得以圈去了绝大多数的经济利润。而制造业、尤其是中小企业的投资融资则变得日益困难。从机构发展(institute development)角度看,经营管理这些流动性的首要主体(商业性银行机构等)现今已高达4500多家,真可谓品种层次繁多!“金融新政”之前的“利率市场化”“局部供应改革”和“靶向精准调控”等,尽管也一直努力不懈,但仍然难以让整个局面有根本的改观。“金融新政”的手笔则是划时代的,它意味着各银行经由管道业务流出的贷款资金短期内势将回流25万亿之巨!2017年以来,企业深感货币政策收紧,无疑非常正常。

市场资金的供应减少与把关趋严,直接导致企业“借新还旧”的成本急剧地飙升。2017

年年中全国多数企业债券的利息率已超过 9%。这对企业资金成本势必是直接提升，此外企业还要担负 25% 的企业所得税。好在这类企业的比重毕竟只在 15% 左右，否则 2017 年 GDP 增长业绩不可能有那么好。地方政府债务融资平台的进一步贷款也明文遭遇刹车。这当然是一件好事，但由于允许发行地方政府债券，其结果只能是社会理财资金的风险加大。因为许多地方政府项目未来正常归还的不确定性非常之强。“金融大老”如万达王健林等的紧急套现，乐视贾跃亭的出走，还有融创孙宏斌的仗义援救，的确都让人眼花缭乱难得其解。但其实，也许可以这样解读，“顺势优美倒下”也未必是一件大坏事；既然能够从银行贷出万亿资金，那么有恃无恐的心态恐怕很难避免。事实表明，化解这些风险的努力目前已有增加。估计万达的“债转股”、让证券市场去消化的概率是比较大的。其实，更大的金融帝国如“明天系”“安邦”等，也许更值得关注。

### 国企改革思路新在哪里？

国企改革历来是难点。国有企业是国家手中的经济军队，国有银行是这支部队的嫡系部队。上述“金融新政”其实是一套政策组合拳，其中一重要的建设性举措是：将高新科技手段引入传统商业银行的改造。中国建设银行与阿里巴巴的战略合作、中国银行与腾讯的合作等，都是这方面的标杆性事件。2017 年银行业的转型恐怕已经不仅是山雨欲来，而更是未来已经到来。2017 年五大商行各裁员 1 万，应该说这只是开头。未来几年，估计应有百万银行财务人员面临转型。柜台、纸张、人工密集型的传统体制，在（德勤等）机器人面前已经基本没有优势可言。支付宝、余额宝在那么短的时间内，就已经对银行业的揽储进行了强有力的分流。如今的技术已更是进步。独立的分布式的数据库技术，也即“区块链”技术，正在掀起 1993—1994 年互联网风暴以来的新的更加巨大的改革转型高潮。50% 的财务人、70% 的投行人员，将需要接受网络技术新浪潮的洗礼。

就国企改革而言，目前进行的已经是第三轮新的战略。早先两轮“转换机制”和“资产

证券化”不仅一直未能取得显著效果，而且还留下了许多新隐患。新一轮改革，抽去上述技术冲击之外，制度设计冲击力也已空前加大。突出的新思路是“混合所有制”和“PPP”。混合所有制的内涵应该是让国有经济作为龙头，进而在其上下游联合社会资金和民营企业资金等，建造成横向、纵向或混合的新型产业链。其优势在于，可以对国企或地方公共经济，某种意义上形成一种制衡机制；其次，可以加强和利用国企的正统诚信地位，更适于利用物联网新条件下的供应链融资，有助于解决多年来中小企业融资难融资贵问题。促成龙头资金与社会资金二者有机结合的重要纽带之一则是“PPP”（即“公私伙伴关系”，英文为 Public-Private-Partnership）。国外这方面的应用已经非常普遍成功。伙伴关系介于“股份制”与“合作社制”之间，在基础设施投资方面明显具备更多的灵活性。<sup>[8]</sup>目前国内 PPP 的推进，似乎还应当进一步普及与加强。改革新思路在理论上目前也还可以进一步到位，政策上则需要更多的因势利导。应当注意制衡地方政府等部门的过激创新。至于民企如何跟进，最简单的办法就是认真研究商务部的 PPP 项目发布目录。100 个大的项目，每项下都分设有数百乃至上千个 PPP 子项目。一般说来，不到万不得已，请勿另辟蹊径自行其事。

### 如何看待“国退民进”与“万宝大战”？

“民营新政”“简政放权”进展喜人，“民营新政”推出很快就到 10 年，“简政放权”也已经 5 年多了，累计放权已达 600 多项！但为何民营投资的增长势头近些年却反而一直在下降呢？原因是多方面的：首先，核心权利恐怕很难下放，各权利主体的生存前提由来已久，短期内很难一笔勾销；其次，公私机构的谈判技术可能悬殊，“玻璃门”“弹簧门”甚至“鸿门宴”决不少见；第三，宏观经济缺少行之有效的增长点，旧常态所能留下的增长点，多数已经是公共品或准公共品的产业，几乎不可能用过去那样的市场激励模式，而新模式的成型恐怕还需假以时日。此外，国情中的伦理、道德、文化、法治等要素的成长，应该说都还需要到位。假

冒伪劣、诚信不足、圈钱骗钱等投机行为或曰“分配性努力”的猖獗,绝对不可以小觑。当然,缺少足够的公共资金和国家补贴,显然是不言而喻的困难。

“万宝大战”表明,证券法恐怕有待进一步探索完善。首先,一个运行良好的企业如何才能依法有效抵御“敌意收购”的条款恐怕还明显欠缺。中国股市毕竟处于转轨加新兴的初期阶段。其次,企业的控股模式也明显存有漏洞,万科究竟是民企还是国企,根据经营者还是根据控股者?法律上并非不无暧昧。再次,控股人与经营人公私性质迥然不同,势必导致一系列证券史上的大战奇观。又次,“造牛”“股灾”“救市”后出现的系列制度漏洞,恐怕也未能及时修补与堵塞,保险业“民企”攻城略地所向披靡的机遇是否与此有关?最后,还要反思的是技术官僚对于顶层调控不无软抗能力。2017年“金融稳定委员会”的成立,应该说是这方面的一大改进。此外,更值得反思的是,整个社会对于民企重要性的认识恐怕还需要进一步到位。报刊上我们依次看到过“原罪赦免”和“不盲目追究”,目前又看到“民企回暖工程”,乃至“全国工商联 70% 领导人已出自民企”等,这是否能体现认识进展的轨迹?其实,就今后国民经济运行而言,民企的投资及其活跃程度恐怕已经成为关键!就市场建设理论而言,民企作为未来中国市场经济的主体这一点,恐怕无可替代。

### 如何看待当前的“主板市场” 和“新三板”乃至资本市场的未来?

2017 年主板市场的走势可谓是一种结构性的慢牛。从 2600 点到 3600 点这个区间,市场箱体震荡已经历时两年多。如果说党的十九大之前以箱体波动为主,那么十九大之后则明显有某种酝酿向上的冲动。之所以说是结构性,是因为 3600 点这道坎,目前投资人恐怕很难没有心结。那是上一次股灾中“国家队”入场救市的点位,当时动用了近 2 万亿资金。之所以说是慢牛,是因为资金推动力度很强,而企业业绩与回报却很难跟进,“资产荒”现象并未缓解。首先,金融新政中外汇被有效监管之后,

投机炒作与资金外套的空间已被压缩。大量的资金势必需要寻找新的机会,而股市无疑是最大吸引之一。其次,房地产调控限购的力度已是历史空前,大量资金也需要寻找新的盈利途径,主板与新三板当然又是一个大概率的选择。股市池中的水量如此明显增多,水涨船高或者说难以退潮的情况,恐怕都是可以想见的。最后,“十三五”来了,各种新规划所提供的大量的投资机遇,委实令人目不暇接。除了雄安,目前全世界超大型工程,还有上述的“红旗河”,都的确令人摩拳擦掌跃跃欲试。预计 2018 年股市继续努力向上是大概率的事件。

中国资本市场的先天弊端在于它的模拟性质,简言之也即在于它的“政策市”属性。这个市场成长的动力最初就是从“国有企业解困做大”开始的,后来演进成引导部分国民储蓄助力“直接融资”的实验。多次磨难之后,目前的进展目标似乎在于努力让它成为计划配置或曰靶向调控的平台。该市场的弱点与其优点一样,同样都在于它的“政策市”属性。然而这种属性的意志主体却又并非那么集中与统一,而是多层次、多部门利益博弈的复杂体与混合物。由上而下遴选企业的 IPO 上市制度恐怕需要更深刻地反思。“倒金字塔结构的矫正”应该是未来的长远战略任务。至于新三板,发展过快恐怕是个问题,显然容易产生各种问题。改革设想原定的 2020 年达到 6000 家的目标,到 2016 年就已经超额完成,达到了 1 万多家!争先恐后批量涌入的结果,已经导致新的“分层改革”裹足不前。2016 年年初曾就当时的 6000 家分成 4 组跟踪统计,研究结果表明,可以继续跟进的新三板股票,只占到 2% ~ 4%! 未来该市场成长,恐怕应从“土地确权”和“草根四板市场”的成长那里,才能更好地找到答案。<sup>[9]</sup>

### 如何看待中国房地产调控新思路?

这类问题应该说错综复杂,很难一概而论。基本趋势应是:房地产作为投资标的或曰保值增值的对象的黄金时段,在大部分地区显然已成过去。“房子是用来住的,不是用来炒的”。新的调控思路,简言之则在于:跨越“制度转型陷阱”,矫正“政府不灵”与推动“法治升级”。

当今房地产问题的症结在于虚拟过度,“制度设计”过于强调效率和数量。“GDP 冲动”“经营城市”“反向优惠”在解决住房短缺和创造“奇迹”的同时,势必导致“价格畸高”“相对过剩”和“分布失衡”等问题。将房地产当成“私人品”“投资品”并放任“市场杠杆”的负面后果,肯定是“贫富两极分化”和“有支付能力的购买需求不足”。这也是现代经济学所谈的“市场失灵”中的一类:市场所能解决的只是生产和交换的效率,而无法顾及分配公平。然而房地产在一半意义上并非是私人品。“居者有其屋”,政府有一般责任。香港、新加坡的公租房、廉租房的 50% 和 90% 是由政府提供的。

将发展房地产的大任交由市场之后,政府本应对“市场失灵”这个“幽灵”始终保持高度的警觉。否则,当“为增长而增长”的癌细胞开始批量复制的时候,政府再出面干预恐怕就很难不陷于尴尬!因为政府也并非万能,政府在进行干预之前,首先应该证明自身不会出现“政府失灵”,这也是重要的为实践证明了的经济学信条。而现行的人事制度和决定干部升降去留的“政绩考核指标”恐怕很难保证做到这一点;不仅不能,而且还会出现“代理人不忠”“造租”“寻租”等一系列“腐败”问题。当某一职务既能带来“名”也能带来“利”的时候,要想让官员们“动力不强大”恐怕非常困难。而当“结构失衡”严重到一定程度时,要想让既得利益集团作出让步,那恐怕也非常困难。在“法治”没有到位的条件下,“行政干预”出现事与愿违并导致“政府失灵”的案例实在是不计其数,即使是在成熟发达的市场经济体中。就当前房地产调控看,不妨先从利益博弈角度,情况也决不可掉以轻心。在艾奇沃斯(博弈)盒状图中,“房价”的多空双方事实上已经僵持在“你多我少、你增我减、你死我活”的“契约曲线”上,改革早期的那种“你多我也不少”的“潜在的帕累托改善”已经不复存在。打破僵持的出路只能在于引进经济体系以外的所谓的“外部冲击”。“外部冲击”包括“技术冲击”和“制度冲击”,前者包括技术进步带来的“新的双赢和多赢机会”,后者则包括“政治改革”和“法治升级”。尽管党的十八

大、十九大以来大批量的“老虎”“苍蝇”们都得到了其应有的处理,但是,“官员房产联网查询”乃至出台“物业税”等,恐怕还是需要时间。2017 年 12 月 20 日财政部长肖捷撰文称,按照“立法先行、充分授权、分步推进”的原则,推进房地产税立法和实施。<sup>[10]</sup>这意味着物业税的出台进程很难不再绵长。

### 如何保护知识产权和创新?

有人说中国是“山寨之国”,这当然十分偏颇,但不可否认,与先进国度相比,中国的知识产权保护的确还存有差距。民用工业核心技术专利少,多数都是边缘项目专利。满街跑的汽车的品牌,鲜有中国自己的,除了吉利、比亚迪还有老品牌红旗等。华为的科研经费比重和年专利申请量在全世界名列前茅,但其主频、屏幕、摄像头甚至闪存等,却仍然仰仗海外。重要原因之一,也许是立法不到位。美国 1789 年立国,次年便出台了第一部专利法,而新中国直到 1986 年才有第一部专利法。<sup>[11]</sup>知识产权保护则更加微妙,中国还处在酝酿阶段这一点,应该说完全可以理解。相信国家已高度重视,相应法律法规也的确在不断地出台。在系统规范统一的法律到位之前,政府行政补位可能难免。行政驱动创新链条的下游,一般都难以灵验。自主创新缺乏、医疗论文抄袭、高校学术腐败,已经不断成为社会新闻热点。更不用说产品供应质量、市场营销诚信、食品安全保障和网络销售公正等领域,亟待解决的问题实在是很多。

应当抱有更多的耐心与不懈的努力,否则势必欲速不达。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劝业教育、工匠精神、契约意识的淡化与滑坡,历时已过半个多世纪了。改革开放 40 年来,“分配性努力”逐渐定价畸高,成为中国经济社会最难攻克的习惯势力。更值得重视的是:事业企业不再分流,教育医疗都成了(旨在赢利的)产业,等等。<sup>[12]</sup>互联网和物联网的应用普及之后,新技术在加速人际合作的效率的同时,也在加速“信息不对称”和“诚信缺失”,其结果便是我们看到的光棍节(双 11)的购物量和退货量双双登峰造极。回顾政府发起的供应改革,从强调数量走向强调质量,实在是高明和及时。

2018年是改革开放40年，也是第一个产品“质量年”！

### 比特币与区块链能带来何种商机？

比特币是一种数字货币，是在独立的分布式数据库条件下经由一系列数字计算结果，这个结果被体现为一个酬劳对象物（ICO）。比特币是次贷危机时期一群计算机天才共同设计发明。据估算，到2140年，比特币总量将达到上限——2100万个。<sup>[13]</sup>比特币毫无黄金或实物购买力作为依托，而只是一枚价值对象物，可以被有兴趣者收藏，也可以在特定场合用来交换、支付与投机。由于没有内在价值，比特币作为炒作对象是最合适不过的。尤其是在区块链这种比特币技术的升级版已经出现且应用前途已经无可限量的近年。作为供应有限的收藏品，比特币的价格波动极限几乎没有边界，取决于究竟多少货币来追逐与抢购。若全世界货币都来，则它势必价值连城；而若无人问津，则它将分文不值。自2008年11月比特币首笔交易发生至2016年底，其价格最高不过1000美元左右。但是2017年以来，也许是由于中国投机大军的趋之若鹜，比特币的价格扶摇直上。尽管2017年9月中国政府明令禁止炒做，但10月后投机势力又蓄势报复性反弹，不仅瞬间收复失地，而且攀高到令人难以置信的程度，12月竟然被炒到2万美元高点。2018年1月，曾经风光一时的比特币又几近腰斩，其价格从2万美元一度跌至1.1万美元。<sup>[14]</sup>波动幅度之大，真如过山车一般令人眩晕。

区块链是其支撑基础物联网数据库空前进步条件下的新技术，是比特币的发扬光大版。区块链不再仅仅可以发挥数字货币的作用，而且还可以发挥数据存储、数据鉴定、金融交易、资产管理、选举投票等五大功能，对于货币编程、金融编程和社会编程，乃至让未来的数字世界无限逼近物理世界，都将是一枚能量无比推力无限的火箭。区块链已经被投入世界经济的应用实践。2016年8月，英国巴克莱银行经由浪潮公司促成了一项为数10万美元的国际贸易支付，已经让数字信用证登上了历史舞台。未来10年，传统的信用证，包括互联网条件的

数字签名和传统条件下纸质书写签名的信用证，都将退出历史舞台。传统的信用证需要数月，互联网的需要7天，而区块链信用证只需要4个小时。中国人民银行一直跟踪关注该技术的进展与突破，尽管不可能承认比特币，这与全世界最大的9家银行一样。但是，这9大银行2016年却全都宣布将采用区块链技术，目前这些银行的集中的数据库正在转型到独立的分布式的数据库。就具体商机而言，新的学习产业、合作沟通产业，诸如营销、档案乃至婚介等服务行业，无疑会有更显著的改进空间。而银行业，硬件、软件乃至新一代技术培训业等，都将不再遥远。

### 应否创建“中国经济学派”？

经济学说史告诉我们，一国“经济盛衰”与其“经济学辉煌”并无正相关关系。“日不落帝国”横行之时，英国经济学并不强大；而“剑桥学派”崛起之后，英国经济则已走向衰落。美国经济在20世纪30年代之前也曾迅速增长半个多世纪，但其经济学的影响却一直滞后；罗斯福“新政”经济学、也即“凯恩斯革命”的策源地是英国而非美国本地！二战后美国的经济学空前强大之后，美国经济则首先陷入了前所未遇的“滞胀”低谷。世纪之交以来，美国的“新经济”逐渐兴盛全球，但其“新经济学”却仍然幼小。近半个世纪以来，货币学派、合理预期学派等都取得了显赫的成就，都对凯恩斯主义提出了强有力的挑战。但恐怕还不能说它们都已超越了凯恩斯体系。

“中国奇迹”誉满全球，中国经济学人的努力无疑已经非常耀眼，甚至不无后来居上之势。尤其是在转型改革领域，所取得的成就可以说是独树一帜，如“一带一路”建设、“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等。然而，中国经济学所面临的挑战也的确非常严峻。诸多核心学术命题都还未曾正面攻克。例如，中国从计划经济转向市场经济的逻辑步骤是什么？目前的“改革三部曲”，也即确定目标、制定规划和落实执行这三部曲，<sup>[15]</sup>是否已经成了后来者难以改进的经典？又如，多年来改革争论热点的分布似乎也能折射中国经济学人的欠成熟。这些争论曾经包括：

先发优势和后发优势孰优孰劣?产业政策是否该要?中国股市是不是赌场?等等。其实,经济学的真谛是:既强调“适用”也追求“严谨”,更无须首先讲“名分”。“主流”也罢、“非主流”乃至“不入流”也罢,关键还是要看是否深刻地实事求是与有的放矢。好射手的美名不是来自他的弓箭,而是来自它的目标。正如吴冠中先生所言,“风格只是作品的背影,作者自己是看不见的”。

总而言之,改革开放40年来,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的经济建设取得重大成就,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深入推进,经济结构不断优化,发展质量和效益不断提高。同时也应看到,我国改革已进入攻坚期和深水期,需要解决的问题格外艰巨,都是难啃的硬骨头。必须全面深入地贯彻党的十九大精神,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加快建设创新型国家,加快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只要脚踏实地,锐意进取,埋头苦干,就一定能够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

#### 注释:

[1]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统计局:《2017年经济运行稳中向好、好于预期》,2018年1月18日, [http://www.stats.gov.cn/tjsj/zxfb/201801/t20180118\\_1574917.html](http://www.stats.gov.cn/tjsj/zxfb/201801/t20180118_1574917.html), 2018年1月26日。

[2] World Bank Group, JANUARY 2018, *Global Economic Prospects: Broad-Based Upturn, but for How Long?* 2018年1月9日, <http://www.worldbank.org/en/publication/global-economic-prospects>, 2018年1月26日。

[3] 刘世锦:《加快推进与高质量发展配套的重点改革》,《经济日报》2018年1月11日,第14版。

[4] 本报评论员:《坚持稳中求进 加强政策协同——三论贯彻落实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精神》,《人民日报》2017年12月24日,第1版。

[5] 吴敬琏:《中国改革三部曲》,北京:中信出版集团,2017年。

[6] 萧琛、石艾馨:《“一带一路”伟大实践所折射的新一轮改革开放命题》,《新视野》

2017年第1期。

[7] 萧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风险掌控、目标校准与力度权衡》,《北京大学学报》2017年第2期。

[8] 厉以宁:《非均衡的中国经济》,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2015年。

[9] 萧琛:《论中国资本市场“倒金字塔”结构的矫正》,《北京大学学报》2014年第6期。

[10] 肖捷:《加快建立现代财政制度》,《人民日报》2017年12月20日,第7版。

[11] 萧琛:《论中国经济升级的理论内涵与政策取向》,《北京大学学报》2013年第5期。

[12] 萧琛:《去广义虚拟过度与“新常态经济”制度设计》,《北京大学学报》2015年第3期。

[13] 李捷:《比特币为啥火过黄金?》,《人民日报海外版》2017年1月6日,第3版。

[14] 梁睿:《理性认识比特币及区块链风险》,《经济日报》2018年1月26日,第14版。

[15] 根据中国改革的历史经验,通常说大的改革行动要奏响三部曲:第一,确定改革的目标;第二,进行总体设计,制定改革的路线图;第三,执行总体方案,使各项改革措施落到实处。参见吴敬琏:《改革三部曲已经进行到第三部》,《上海证券报》2014年4月2日,第A1版。

责任编辑 马相东